

# 军旅笔记

吴建国

麦种

八路军的这支部队东渡黄河一年后，营长接到命令，要他率部在陈川铺的公路口上，阻击进山扫荡的日军，时间四个小时，以掩护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。这是日军的一次局部行动，很突然，天刚亮，日军就到了。来不及构筑工事，借助有利地形，一百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，阻击日军两个中队的冲击。战斗至中午时分，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，但敌人的攻击没有间断过，这使得部队没有调整的时间和余地撤出战斗。直至天黑，全营剩下的三十多人中，有轻重伤员十多名，营长命令，掩埋好牺牲的战友，就近撤到公路里侧一个叫鱼儿沟的小村里。

鱼儿沟四面环山，进村的路只有一条，在悬崖和深山沟的中间，像一条靠山的河岸，很窄，驴车勉强能通过，长度足有三百米。营长熟悉这里的地形，只要封锁了进村的路，村里是相对安全的，这有利于救治重伤员。

“你们、你们是八路军？”黑暗中，是一个老人的声音。

“是的，老大爷。” 营长迎上去，“你老人家怎么没走啊？”

“是村长让我等着的。”老人看到了躺在院子上的伤员，一边让大家进屋，一边仰起头喊：“客来了——！客来了——！”

营长和他的战士们都在纳闷，不一会，村里几十口人都回来了，男人们的肩头都搭着一圈圈攀山用的麻绳。

村长和这片几个村的干部，是春天里在县里开会的时候，认识营长和这支部队的。上午，他们站在山顶上，看到大队人马朝西北方向缓慢移动，如果不是营长和他的战士们阻击日本鬼子，整条公路上定会血流成河。村长由此想到，鱼儿沟离山口最近，打阻击的队伍说不定会到村里来，因此和乡亲们商量后，决定不走了，就在山上等。

“家家户户，点火烧水做饭；刘七狗，把你家的药拿出来救治伤员；五柱你们三个把猎枪扛在肩上，到村口去放个哨，你们耳朵尖，听仔细了，有动静马上向八路军的同志们报告。”村长对营长说：“我估摸着，天亮前，鬼子不敢进来的。”

营长还是不放心，他和村长一起来到村口。“鬼子的伤亡也很大，又打乱了他们的扫荡计划，他们是不会甘心的。现在，外面的道路已经被鬼子封锁了，我们要做更长时间的准备。”

村长点点头，“我这就去安排。” 晋西北的初冬，半夜里已经寒冷难当……很快，战士们每人吃到了一大碗滚烫的麦粥。天亮了，守在村口的营长习惯地观察着地形，他发现旁边的这条深沟宽足有一百米，底部流淌着的水道有两米宽，两侧都是田地，这就是鱼儿沟，多么好的地方！卫生员来了，他向营长报告：伤员都处理好了，老乡拿来的药很管用。他还报告说：“村长和大家商量后，把全村一百多斤麦种拿出来……”

营长的眼睛湿了，他对守在工事前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，老百姓把麦子种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一定要消灭日本侵略者，还老百姓更多的麦子，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！”

觉悟

车副参谋长分管车辆装备，新兵们误以为，部队的首长管什么事，就称呼什么姓。因此，一位管后勤的副团长本来姓李，我们都叫他后副团长，闹了笑话。

车副参谋长是老革命，1946年16岁的时候，从少年儿童团直接转入了县大队，那年，他加入了共产党，当了县大队的分队长。他说，他的革命生涯里，有过两次重要转折。

第一次，他因为想娘悄悄跑回了家。娘知道儿子没有请假是犯了纪律，往他手里塞了几张鸡蛋饼，叫他连夜回到队伍上去。他穿过胶烟公路的时候，正好碰到野战军从前方押解俘虏回来，天蒙蒙亮，他站在路边数着

据史料记载，同济大学校友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16年。笔者近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《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》，偶然发现，抗战时期，在延安，竟然还曾有过“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”：

1941年9月6日，为响应中央统战部号召，在延安的部分同济大学校友成立了“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”，总干事夏光韦，干事有徐纪纲、赵安博、王震之，总计有17人。该会系统一战线工作性质的社会团体，后改由中央青委领导。

凭借多年的研究积累，上引文中提到的总干事和干事四人，除赵安博外，其他三人我还算有所了解。

夏光韦是东北人，原名夏杰超，1928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设电机学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参加过赴南京请愿活动，是同济大学东北同乡抗日救亡小组负责人，曾邀请、组织车向忱来校演讲。到延安后在自然科学学院物理系任教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作为军代表，夏光韦曾在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负责军工产品的生产和验收。1952年起，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、应用化学研究所、机械电机研究所副所长，计划局及基建局副局长等职。

王震之，原名王国宾，1935年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，后升入本校工学院测绘专业。因创作揭露日本浪人走私活动的三幕话剧《官员》、宣传抗日救国而受到警告后，愤然离开学校，于1938年到延安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

和这两个师会合的可能。急行军是以连为单位各自行动的。甚至营连级的指挥员都清楚，影响这个仗制胜的不利因素是远离大部队的后勤保障。他率领的连队最先赶到沂河边构筑工事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随他们连行军的老百姓的支前车队也到了。这场阻击战打了七天，七天里，弹药物资没有中断过，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，不幸的是，他们连身后支前的老百姓也出现了牺牲，而牺牲的这八个人都是来自一个叫斗沟的村庄。他自责难当，撤出战场的时候，他和全连的战士们跪拜在牺牲的老百姓坟前，这个时刻，他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人民的支持，才是一支军队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！

部队渡江后他当了营长，那年他刚20岁。他带兵打仗的办法很多，但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却很简单，就是给战士们讲俘虏教导团里这个故事，讲沂河阻击战时老百姓的支持和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到六十年代初期，他已是东南前线后勤基地的副师级司令员了，他还是用这两个故事两段话，勉励自己也教育他的下属。在后勤基地建设初期，为少挖一棵老百姓祖传的橘子树，他让进入营区的大路转了很大一个弯。

“文革”开始前，后勤基地撤销了，他调到内地某机场担任正团级场站站长。八年后，这支部队精简了，他调到我们部队担任副团级副参谋长。他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，坚决服从命令履行职务。车副参谋长精通业务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严格管理部队，知道他革命经历的人，都为他感到惋惜。他还是讲这两个故事两段话，让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干部战士深受教育和鼓舞。战备油料存储不足，他亲自驾车组织抢运油料，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。基层连队战士的父母来部队驻地治病，都可以用他的工作车接送病



古田村窑塘的朱屋——中央机关从瑞金转移于都后的驻地（油画） 陈健君

## “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”钩沉

章华明

剧系教员、实验剧团主任、延安留守兵团艺术学校副校长、西北联防军政治部部队艺术工作团团长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研究所所长。

徐纪纲的信息相对较少，只知道他在同济大学就读期间，曾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到延安后也曾任自然科学学院工作。进一步研究发现，1941年11月，徐纪纲和同事、同济大学校友王立等曾联名写信给朱德总司令，建议将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，被采纳。两厂合并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（也称温家沟兵工厂）后，徐纪纲就在该兵工厂从事生产管理工

关于赵安博，笔者在搜检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一张照片。该照片系著名摄影师沙飞次女王雁在2016年初公开，题为“王震向日军战俘阐明八路军政策”，并明确注明是沙飞所摄。王雁说，这张照片是“在查询父亲沙飞留下的照片里”发现的。但笔者认为，“父亲沙飞

人，月底发工资的时候，他自己到财务科交汽油钱。

八十年代末，他到了退休的年龄，部队党委向上级请示，想让他享受师级待遇办理离休，他知道后，直接打电话给兵部首长，“为我一个人改变一条部队的规定是不应该的，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，看到今天老百姓的生活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不安……”

后记

2020年4月14日上午，我收到黄浦区基层党建信息管理系统微信：今天是您入党41周年的纪念日，希望您牢记入党誓词，不忘初心，为实现梦想努力拼搏……

这个时刻，我又想起了近二十年军旅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共产党员，他们让我心潮澎湃，夜不能寐！说“老百姓把麦子种在我们身上”的是我们兵部的首长，这位当年的八路军营长，一生都在践行“还老百姓更多的麦子，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”；时刻感到愧对牺牲的战友和老百姓的车副参谋长，济南战役的时候被炮弹削掉了右边的臀部，他一生拒绝领取《伤残军人荣誉证》，他心里的内疚和不安，恰是形成一个共产党员思想品格和觉悟的基础。

今天，记录这样的故事，对于我，本身就是一堂党课，他们又一次让我感到自豪和荣光，感到来自于这个称号的巨大力量！当年的八路军营长和车副参谋长等老一辈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他们的初衷和精神实质，就是自觉的奉献和牺牲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如果缺少了自觉的奉献和牺牲，共产党员的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；如果远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，任何鼓动和宣传都是无力的！

2020/4/27

偶见人引用波德莱尔“名句”曰：“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，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”。初见之下，略觉疑惑。大学时期通读过波氏的《恶之花》及《巴黎的忧郁》等代表作，不记得有这样的诗句。上面的这一诗行，从内容和情调看，与波氏的风格也相去较远，而与如今的网络写手一知半解的所谓“文艺范儿”的庸常风格，倒有些相似。

我在大学时对波德莱尔的阅读，离开现在也已很久，对那句“名言”是否为波氏所作，自己也不敢确信。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》中钱春绮先生所译的《恶之花》及《巴黎的忧郁》的权威译本翻检出来，前前后后通读了几遍，都没有寻到上述的那一行诗句，便初步下了一个判断：这行诗句并非出自波氏之手，是“假德莱尔”之所为。

这一行“伪诗句”是怎么来的？又为何要系在波氏的名下呢？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兴致上来了，非“查一个水落石出”不可。在网络上用“波德莱尔 停留”这样的关键词一搜索，果然，出现了许许多多条上述“伪诗句”的搜索结果，可见它流传很广，可能被不少“文艺青年”视作自己最为心爱的“诗歌妙句”，时时挂在嘴边或记在心里，也算是与他们认为“高大上”的现代派大家波德莱尔建立了“亲密关系”。实在是贻害不浅。

这些搜索结果，大部分都只是引了上述“伪诗句”的本身，并标示“出自《恶之花》”。细细看了一遍，发现个别的搜索结果更为“详细”一点，引出了这一“诗句”的上下文：“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，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，不要把你一个阶段幻想得很好，而又去幻想等待后的结果，那样的生活只会充满依赖，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，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。”

这上下文的首两句：“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，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”有点眼熟。再回到《恶之花》钱春绮译本中细检，在《恶之花·巴黎风光》的第八首《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》的最后一段，终于找到了一点“眉目”。那最后一段是这样的：“去了！远了！太迟了！也许永远不可能！/因为，今后的我们，彼此都行踪不明，/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！”

由此，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测，网络写手借了波氏《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》诗中末句一句“今后的我们，彼此都行踪不明，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”，然后就要加“发挥”，按照他们的“生活感悟和心灵情感”，敷衍出一堆“伪诗句”，而被引用者误信为波氏诗句的“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，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”，更是其中被“误传”得最广的。

不仅于这一例，我还联想到杨绛先生仙逝的时候，网络、微信上广为流传的“杨绛格言”，不少也是类似于上述对于波氏诗句那样的“移花接木”。记得当时看到“杨绛格言”中传得最“疯”、最广的一句中，有一个“曼妙”这样的用辞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估计出一个“八九不离十”：这是“伪句子”。像杨绛先生这样语言和学问修养程度高的大家，如果用“鸡汤”式的“曼妙”这样的用语，实在有点太“妙不可言”了。除此之外，记得几年前，在《文汇报》的笔会上，还看到过现代文学研究家陈福康先生写的一篇文章《郑振铎没写过这篇散文》，其中说的那一篇伪托郑氏的所谓名文《唯一的听众》，其实是一位网络写手所作，却在网上被众口一辞地称作“郑振铎的名文”，而且被不加分辨地选入了学校的课本，被学校的老师们做成了各种各样“言之凿凿”的课件分析。

行笔至此，倒并非打算做一通“考据”的文章。实在只是觉得，目下这个所谓“网际”的社会，总逃不了这种恶俗的趋向，就是“不老实”、不认真、

李荣

不负责，不是出于自己真心的体会和分析而只是人云亦云、附庸风雅的一种庸俗病。这种病症千万不能从校园蔓延——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，把社会上的一些病态、模糊和混乱的东西“点破”，而千万不能反转过来，老师自己沉迷于微信、百度、知乎上一知半解的东西而不能自拔，以此水平来进行教学，那一定会等而下之，最后一滑到底。为什么古希腊戏剧有“教育功能”，就是因为它有对社会“点破”的功用。这里，不免想到鲁迅先生的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其中两句话说得最好：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；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。这就是“点破”的作用，老师、学校的作用就在于此。学生心里“明亮”了，今后走向社会，才会更明白。

没有教育上“点破”的这个根本，无论怎么样的创新或者想“与众不同”，到最后也只是“考老师”，而不是考学生，就看老师的学识水平、理解力、想象力和对学生们不同思想、理路和想法的悟性是否跟得上。如果只是开放为表，而依然“僵化的应试”为里，校园不过是做一个知识贩卖所和适应社会的预成班，或者甚至是一个多样社会时尚的“包装厂”，那只能是适得其反，不仅不是“点破”，而是更深的迷误，对学生是如此，对学校和老师更是如此。美国名哲、小说家亨利·詹姆斯的兄长威廉·詹姆斯有言，一门学科的天敌，实在是那门学科的教授。这句话，不应简单地只是视作愤激语也。

